

## 近世俄国文献关于朝鲜的记载和初识

张建华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期以前为俄国初识朝鲜时期,此时期俄国文献中偶见关于朝鲜的记载。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代表了17-19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斯帕法里; 冈察洛夫; 比丘林; 朝鲜

自17世纪70年代俄国使节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使华日记中首次出现朝鲜形象,到19世纪初传教士兼汉学家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首次在北京直接与朝鲜人交谊,直至著名作家冈察洛夫(И.А.Гончаров)1854年随俄国“巴拉达号”(Фрегат“Паллада”)三桅战舰登陆朝鲜巨文岛并短暂停留,俄国对朝鲜的早期认识经历了二个多世纪。<sup>①</sup>

按照俄罗斯著名朝鲜问题学者鲍里斯·朴和韩国历史学家朴泰根的俄朝(韩)关系分期,1860年前均为两国未建立直拉贸易和官方关系之前的“早期阶段”(раннее время)和“漫长等待时期”(длинное и ожидание время)。<sup>②</sup>

本文试图借助俄国文献,对19世纪中期以前的俄国对朝鲜的记载和认识做一述评。

<sup>①</sup>关于俄朝早期关系的研究,国内学界鲜有涉及,利用俄文资料研究者甚少,所见有潘晓伟的博士学位论文《俄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60-1910)》(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09年)以及他发表在《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1期)上的《俄国早期来华使团与朝鲜》。台湾学者林明德著有《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1882-1894)》(台北玉山书局1990年版)《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版)提及早期俄朝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根据其收藏清代总理各国衙门文献《朝鲜档》,编辑了11卷本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苏联时期关于俄朝早期关系的研究不多,大多在关于中俄和日俄关系,以及日俄战争著述中顺便涉及。如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 Б.А.)的《俄国在满洲》(陶文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也有少量从俄国殖民开发史角度研究著作,如阿诺索夫的《南乌苏里边区的朝鲜人》(Аносов С.Д.Корейцы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Хабаровск-Владивосток,1928.)。1931年出生于海参崴的苏联国籍的朝鲜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教授鲍里斯·朴(Борис Дмитриевич.Пак)所著《俄国与朝鲜》(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М.,1979.)是唯一著作,他将俄朝早期关系划分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0-1898年。第二个阶段是1898-1910年。他还著有《帝俄的朝鲜人》(Корейц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Иркутск,1964.)。20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学界对朝鲜(韩国)问题研究关注度大大提高,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之外,大学纷纷设立韩文系或朝鲜问题研究所。鲍里斯·朴在90年代中期又出版了《1917年至30年代末苏维埃俄国的朝鲜人》(Корейц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7-конец 3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Иркутск-С.Петербург,1995),接续了《俄国与朝鲜》的研究,可把十月革命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视为其笔下俄朝关系的第三个阶段。鲍里斯·朴的研究不仅立足于俄文和朝鲜文文献,而且还大量使用日文文献。2006年4月12日,俄罗斯学术界隆重纪念鲍里斯·朴75岁寿辰和从事学术研究55年,以及著述150部(篇)的学术成就。韩国学界素来极其关注俄朝(韩)关系,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庆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均设有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系(科),并设有全国性的韩国斯拉夫学研究协会(Korean Association of Slavic Studies)。其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代表作如朴庆孝(Пак Чонхе):《俄国与朝鲜1895-1898》(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1895-1898.М.,1993。《日俄战争与朝鲜》(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04-1905гг и Корея.М.,1997。)

<sup>②</sup>Пак Б.Д.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М.,2004.С.1-3. Смирлицева Т.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в Пекине в конце X VII-XI X в.(по дневникам корейских посло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8.№.6.

## 一、斯帕法里、朗克笔下的朝鲜和朝鲜人

17 世纪初，俄国加速对东部地区和东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步伐，东方民族和东方国家才越来越多地为俄罗斯人所知晓。到 17 世纪 40 年代，沙皇政府将西伯利亚全部纳入版图之中，将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曾经相互隔绝的中俄两国得以直接面对，中俄关系开始成为两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内容。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Спафарий)<sup>②</sup>在 1675-1677 年他受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Романов)的委派，率 150 人的俄国使团访华，目的是重新勘察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斯帕法里使团行程从叶尼塞河到外贝加尔，然后进行中国嫩江，开辟了从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到中国的道路。1676 年 5 月中旬，斯帕法里使团到达北京。使团长期逗留北京，但没有取得任何的外交成绩，清朝皇帝康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见斯帕法里。1677 年春天，斯帕法里返回东西伯利亚。

在北京滞留期间，斯帕法里与耶稣会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有幸结交。此时南怀仁时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颇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早期俄国使节无人通中文，清政府也缺少懂俄语者。南怀仁被斯帕法里聘为他的中国问题的外交顾问并负责正式外交谈判时的翻译工作。南怀仁还送给他的《坤輿全国》<sup>③</sup>。

斯帕法里相继发表了《中华帝国志》(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ых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ой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аы и провинции)、《穿越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до границ Китая)、《行程札记》(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和《中国纪行》(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я)，向俄国和欧洲透露了鲜为人知的中国地理、历史、风俗、政治以及中国社会，一时轰动了欧洲。

《中华帝国志》(第 57 章)在俄国首次介绍了朝鲜与清朝的属从关系，以及他所了解的朝鲜的风物和民情。即：“朝鲜人和中国数次对抗，数次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但最终又被纳入中国政府的更严厉控制之下，20 多年前满洲人曾强迫他们按照满洲习惯留发和着服。”<sup>④</sup>斯帕法里借鉴南怀仁所赠其亲手绘制于康熙甲寅年(1674 年)的《坤輿全国》绘制《西伯利亚全国》，他在图上特意在黑龙江江以南的阿穆尔岬的下方标出“朝鲜王国”(корей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斯帕法里在《中华帝国志》中写到：“从阿穆尔河口到中国并不遥远，但要经过一个周折。必须绕过朝鲜内河，航行大约二百俄里

<sup>①</sup> 本文所述“朝鲜”(Крея / Korea)是朝鲜半岛的古称，而非冷战后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划分。

<sup>②</sup> 在清朝典籍中他被称为“尼古赖”、“米果赖”或“尼郭莱”，于 1636 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大公国的瓦斯鲁依镇(Васлуй)米列什奇村(Милешть)的领主家庭，他的血缘有一部分来自希腊。他的罗马尼亚文名字为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Neculai Milescu Spătarul, 俄文音译Николае Милеску-Спэтару)。除其母语罗马尼亚语外，他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俄语、中文、法语和瑞典语等 14 种语言。1653—1671 年，他曾经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服役，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外语所长完成了在君士坦丁堡、斯德哥尔摩和巴黎的外交事务。1671 年，耶路撒冷牧首达西菲(Досифей)派他到莫斯科，并根据俄国射击军首领马特维耶夫(Аргамон Матвеев, 1625—1666)的邀请留在俄国，马特维耶夫深受彼得一世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的信任，因此斯帕法里被推荐担任俄国外交衙门的拉丁语、希腊语和罗马尼亚语的翻译，不久成为首席翻译。此间，他出版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神学内容的著作，并且为沙皇、贵族以及马特维耶夫的女儿编写了教科书，堪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俄国著名的学者。

<sup>③</sup> 《坤輿全图》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制图法，表现了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风貌。为 8 幅柱屏式拼接，每幅轴高 171 厘米，宽 51 厘米。主图有 6 个条幅，组成东、西两半球。《坤輿全图》受中国的“中央之国”思想和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的影响，这幅地图以中国的京师(现北京)作子午线，定位 0 度，且认为地球的极半径大于赤道半径。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幅早期的中文版地图。

<sup>④</sup> Спафарий Н.Г.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С.283.

即可到达北京。”<sup>①</sup>

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提到了朝鲜使团进贡北京时的驻地——玉河桥西的“会同馆”，“院子很大，只是房子有些破旧，并有多处倒塌。院子的周围有一道石墙，高二俄丈半。宾馆内房舍是石筑瓦顶平房。天花板是木头的，没有铁架子。院子里没有花卉及其他景物，景象凄凉，犹如监狱。一旦有人住进去，马上派驻哨兵，严加看守……”。

<sup>②</sup>

朗喀（Иван Лоренц (Лаврентий) Ланг/Lorenc (lavrentij) Lang）是瑞典人，<sup>③</sup>6次奉俄国政府派遣使华均留有对中国政治、社会和风俗见闻的日记。1726年出版使华的笔记《Journal du sieur Lange, contenant les négociations à la cour de la Chine en 1721 et 1722》，俄文缩译本名为《穿越俄国的短暂旅行》（В беглых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через Россию），1776年首次在圣彼得堡出版。1822年《北方档案》（Северный Архив）第17、19、20、21、22、23期连载了上述文本的俄文全译本《俄国皇帝使节罗伦茨·朗喀1721年出使中国宫廷笔记》（Под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о пребывании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агента император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 китайском дворе в 1721 г.），再次在俄国和欧洲引起轰动。

1637年城下之盟的结果《丁丑约条》（清崇德二年，李朝仁祖十五年）规定了朝鲜向清朝贡献朝觐之规仪：“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sup>④</sup>朝鲜随即开始派出使团出使清朝履行称臣纳贡的义务，清与朝鲜在宗藩关系架构下的朝贡贸易也由此展开。

朗喀中国之行留下的笔记翻译成俄文的极为少见，并且随着年代久远，一般人已经无法看到。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教授沙法拉诺夫斯卡娅（Т. К. Шафрановская）在《苏联中国学》（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年第4期）上发表了《罗伦茨·朗喀的数次北京之行》（О поездках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в Пекин//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М.,№. 4.1958.），她在《东方国家和人种》上发表了罗伦茨·朗喀北京之行和他的日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в Пекин и его дневники //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Вып.1. М., 1961），其中引用了不少朗喀当年的笔记内容。

沙法拉诺夫斯卡娅叙述朗喀已经注意到了朝鲜与清政府特殊的朝贡关系。朗喀记载：“朝鲜定期向中国进贡，大约每年两次，分别是在3月和8月份，来北京的朝鲜使团规模一般在40-50人左右。”朝鲜使团每次进京都驻扎在礼部会同馆（东江米巷南）的“高丽馆”，它们向清朝进贡中国上流社会喜欢朝鲜的扇子、编织的凉席、白棉布、油纸伞以及海产品，而清政府一般也要赏赐厚礼，如瓷器、上等生丝、苏州丝绸和薄绢以及茶叶等。朝鲜使团中除政府官员外，还有一些朝鲜商人。按照清政府规定，朝鲜商人携带“八包”货品，进入北京后在会同馆等处开市，直接与清朝市民和商人进行买卖交换。朗喀认为朝鲜作为清政府的属国，是没有直接的外交权和外贸权的，“中

<sup>①</sup>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8页。

<sup>②</sup> Смирнова Т. 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в Пекине в конце XVII-XI X в. (по дневникам корейских послов)//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8. №. 6.

<sup>③</sup> 俄文和瑞典文发音应为“朗格”，这里依清朝典籍中常用的“朗喀”。俄文文献中关于朗喀生卒年月记载不详。有学者称朗喀被彼得一世收为义子，也有学者称他是彼得一世的御医阿列斯金（Роберт Арескин）的养子。彼得一世曾出钱资助朗喀到国外学习，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彼得一世身边任职。1715-1737年，他曾6次出使中国。1719年做为俄国伊兹麦伊洛夫使团的书访问北京。1721年8月至1722年8月，留华一年从事俄国与中国贸易事务。1725年作为拉古津斯基-弗拉季斯拉维奇使团成员访华，参与《恰克图条约》的签订。1739年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省副省长。

<sup>④</sup> 《清太宗实录》卷33，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403页。

国人禁止朝鲜与日本等其他国家间进行贸易，禁止外国商船进行朝鲜的港口，更禁止朝鲜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关系。清政府派人和军队常驻朝鲜。”<sup>①</sup>

朗喀注意到“朝鲜使节在北京没有行动自由，既不能接触外国人，也不能和普通中国人交往”。朝鲜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被接入四周封闭的驿站，清政府专门派“两名官员与他们往在一起，以制止他们与外人秘密交往。”朗喀还记录了这样情况，“一旦朝鲜人离开驿站上街，就立即有几个手持皮鞭的满洲武士尾随其后，在街上一旦有人试图接近朝鲜使团，武士就毫不客气地挥起皮鞭严厉驱赶。”<sup>②</sup>

其实，清政府的严密监视并非仅针对朝鲜使团一家，而是历来形成的理藩思维而至，清政府也对俄罗斯馆的东正教士采取了同样的待遇。清代著名掌故家陈康祺（字钧堂）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了“圣祖处置俄国贡使之法”，即“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对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扑者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仆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sup>③</sup>

1722年2月20日，朗喀邀请朝鲜奏请使李健命的随员来俄罗斯馆访，试图商谈俄国与朝鲜商贸关系问题，然而“朝鲜人来到我们的住处遭到了清政府官员的严厉反对，满洲武士就皮鞭威胁他们。我命令将中国人赶出大门外，并警告他们不允许在我的住处这样对待朝鲜客人。这样才得以单独与朝鲜人相见，但时间极短。2月26日，朝鲜人又试图来我处，但这次被中国人挡在了门外。”<sup>④</sup>朗喀与朝鲜使节的会面，是有文字记载的俄罗斯人与朝鲜人的第一次接触，尽管时间短暂并且朗喀的笔记语焉不详，但此次会面给朗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加深他俄国对朝鲜的了解。

## 二、比丘林、冈察洛夫亲识下的朝鲜人和朝鲜

比丘林是俄国东方学和汉学的开创者，也是俄国朝鲜学的奠基人。<sup>⑤</sup>他的著述涉及东方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医学、宗教、哲学、民族、经济、农业、天文、地理和历史。1831年他被选为设在巴黎的亚洲协会（Азиа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Париже）会员，多次获得杰米多夫奖（Демидовская премия）。

比丘林在北京生活的14年里，特别注意结交清政府各级官员，结交基督教的传教士，并且注意与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人士以及中国周边国家人士结交，目的在于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了解对方的国情。比丘林在1810年2月写给俄国东正教管理局总监萨尔蒂科夫（А.Н.Салтыков）的信中建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留学生除学习汉语和满语之外，还应该学习蒙语、藏语和朝鲜语。<sup>⑥</sup>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比丘林不仅掌握了汉

<sup>①</sup> Шаfranовская Т. К.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в Пекин и его дневники //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Вып. I. М., 1961

<sup>②</sup> Шаfranовская Т. К. О поездках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в Пекин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 №. 4. 1958

<sup>③</sup>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九。上海扫叶山房1910年石印版。

<sup>④</sup> Шаfranовская Т. К. О поездках Лоренца Ланга в Пекин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 №. 4. 1958

<sup>⑤</sup> 比丘林全名为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东正教的法号为雅金甫（Иакинф）。他于1777年9月9日（俄历8月27日）出生于俄国喀山省的切波克萨镇的阿库列沃村的神职人员家庭。1785-1799年，比丘林进入喀山神学校（Казанская семинария）学习，在那里得到了比丘林的姓氏。毕业后留在喀山神学院从事教学。第二年成为修道士，获得东正教法号雅金甫。1802年，他晋升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出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院长和神学校校长职务。1807年被任命为第九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领班。1808年1月10日，比丘林率传教士团抵京上任，1821年5月15日比丘林任职届满。为继续从事汉学研究，他一直在北京滞留到1822年。他在北京期间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回国时所带走的图籍、手稿重达1.4万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12箱，由15头骆驼驮运，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然而回国后，他因未能完成宗教使命等情节受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法庭审判并入狱数年。后入外交部从事汉籍翻译和研究。1828年当选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sup>⑥</sup>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скова Г. Н. Выдающийся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о.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к 2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语、满语、藏语，而且掌握了朝鲜语。

比丘林在北京与多位朝鲜学者和官员交往。第十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季姆科夫斯基（И.Ф.Зимковский）在《从蒙古到中国游记 1820-1821》（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1821г.）中记载：“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朝鲜的一位老将军前来拜访雅金甫神父，64岁的老将军名叫柳洪，他人非常善良，并且彬彬有礼。他说他们父子在北京已经住了5年多了。神父用朝鲜语流利地与老将军进行交谈。”<sup>①</sup>

比丘林在1829年出版的《北京志》（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中详细介绍了“高丽馆”的情况，“每年向中国朝廷进贡的朝鲜人住在高丽馆（或者叫朝鲜馆）。使馆建筑简陋，住宿条件恶劣。来京的朝鲜人都在室内搭草席过冬。甚至首席使臣所住地方也不过是隔开的半个房间”。<sup>②</sup>

比丘林与朝鲜政府派驻北京的官员兼学者赵寅永<sup>③</sup>的交往是俄朝早期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唱赋吟诗，交流学问，或者是比丘林向赵云石学习朝鲜文字和语言。经常通宵达旦，不觉天色既白。两人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客居它乡的孤独之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比丘林与赵寅永云的共同感受，也给了他们谈不尽的共同话题。1817年，赵云石奉召回国，行前曾以汉文赋诗送别，序为：“余晤俄罗斯何先生于玉河馆，临别赋诗，以志异邦之谊。”<sup>④</sup>中国学者蔡鸿生考证“何”先生可能出自比丘林的法号雅金甫的希腊文写法“Hyakinthos”的第一个音节Hy的译音。<sup>⑤</sup>

为什么比丘林得以经常性与朝鲜人见面并结交？原因在于“俄罗斯馆”与“高丽馆”相距不远。

清政府为展示“永息兵戈，永远和好”的愿望，于1694年在东江米巷设立“俄罗斯馆”，以接待来华的俄国使团。原东直门外胡家圈胡同的阿尔巴津人的住址被称为“北馆”，东江米巷南的“俄罗斯馆”被称为“南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称：“南馆地当教民巷，系通衢耳目，易得见闻之处。惟北馆地当东直门内东北隅，向称不静之所，旗民杂处，且多贫苦之家。”<sup>⑥</sup>

朝鲜使团的随员李裕省在《旅行者笔记》（阴历1735年10月20日）中记载：“‘玉河馆’——玉河桥上的一个内馆，即朝鲜使团居住的地方。离此不远住着‘大鼻子鞑靼人’。他们一行六人来到我们这里，并和我们一起喝茶和白酒。他们的国家在中国的西边。它的西部边界离中国有两万多里，而东部边界离蒙古不远，距中国不超过六十日的里程。从玉河馆门口沿亮马河下去有一条直达他们驻地的道路。他们和中国签订了兄弟般的条约，出使到这里已经6年了，很显然，是做入质。从衣服上看他们象中国人，从容貌上看，脸膛宽阔而丑陋。”<sup>⑦</sup>这些穿着中国服装的俄国人正是长期在中国生活，每年领受清政府俸禄，并且在行为方式上多多少少中国化了的东正教传教士或俄国留学生。

而“俄罗斯馆”正置于“高丽馆”的旧址玉河桥西的“玉河馆”上。朝鲜学者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顺治初，设朝鲜使邸于玉河西畔，称玉河馆。后为鄂罗斯

---

рождения)//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М.,1997.С.171.

<sup>①</sup> Пак Б.Д.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М.,2004.С.51.

<sup>②</sup>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等著，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翻译组译：《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8页。

<sup>③</sup> 赵寅永（1782-1850年），字羲卿，号云石，朝鲜科举状元。1841-1850年曾四次担任朝鲜领议政。19世纪初以朝鲜侍郎身份派驻北京。他曾采录朝鲜古碑拓本九十七通，编撰《海东金石存考》，后人编《云石遗稿》。

<sup>④</sup>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sup>⑤</sup>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sup>⑥</sup>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

<sup>⑦</sup> Смирнова Т.Русско-корей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в Пекине в конце X VII-XI X в.(по дневникам корейских посло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8.№.6.

所占。鄂罗斯所谓大鼻子捩子，最凶悍，清人不能制，遂设会同馆于干鱼胡同。”<sup>①</sup>为避俄人所扰，清政府将高丽馆迁址干鱼胡同（今东四南大街甘雨胡同），距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不到千米。

1842年出版的《中华帝国详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1842.）是比丘林众所著述中一部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最为详尽的著作。在该书的第二部分里，介绍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如满洲、西藏、蒙古等，也简要地介绍了朝鲜。该部分的第四章即为《朝鲜国家》，详细介绍了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高丽国家的起源、朝鲜的政治制度、朝鲜与清政府的臣属关系，以及朝鲜语言、文字、风俗和习惯。

比丘林在《古代中亚居住各民族资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中叙述了来自中文文献之中的公元前后到9世纪朝鲜半岛的人种历史。该书是比丘林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851年，1950年由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再版，关于朝鲜的内容被列入该书的第二卷。但比丘林将位于东亚的朝鲜划入中亚，明显犯了地理上的错误。

1884年，俄国学者德米特列夫斯基（П.А.Дмитревский）编译并注释了18世纪长期在朝鲜（新罗）居住的日本人雨森藤五郎（Отано Кигоро）于1794年所著涉及日本起源的《翻译家笔记：对马岛周边环境的札记》（*Записк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при окруж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а острове Цусиме*）。<sup>②</sup>德米特列夫斯基介绍了关于对马岛的朝鲜文字记载。内容还涉及对朝鲜日常习俗、节日、首都的位置、国王陵墓、道路、驿站、山川、堡垒和集市的信息，涉及朝鲜人的民族性格、佛教信仰、官制、婚丧嫁娶以及朝鲜的文学与艺术。书中特别介绍了朝鲜人的日常衣着、饮食以及朝鲜名胜古迹。第一次将18世纪朝鲜立法《大典通编》[朝鲜语音译Тэчжон тхонпхён，俄译《大法汇编》（*Общего свода великого Уложения*）]介绍到俄国。<sup>③</sup>比丘林和德米特列夫斯基著作中最早地转译了反映朝鲜中世纪历史的朝鲜文献，同时也是最早的两部关于朝鲜历史的俄文研究著作。因此，比丘林被俄罗斯学界（包括苏联学者）视为开辟俄国朝鲜学的第一人，称他完成了朝鲜中世纪历史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剥离。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名扬世界的旅行家。1852年10月7日，他辞去财政部外贸局翻译官的职务，获准以海军中将普提雅廷（Е.В.Путятин）秘书的身份跟随“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自彼得堡喀琅施塔德军港出发开始环球航行。沙皇政府和军方此行目的在于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东亚进行军事战略和自然地理的考察，并试图与亚洲国家通商。

在长达2年零4个月的航行中，冈察洛夫以作家的细腻笔触和旅行家的敏锐目光，通过信函和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所到之处的山川风物、市井生活、种族民俗以，并且还记录了亲眼所见的各国政治和社会事件。1858年，游记以《“巴拉达”号三桅战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名在圣彼得堡正式出版。

“巴拉达”号计划在1854年3月底抵达日本长崎，然而由于海流的影响，使战舰大大偏离了预定航线。4月2日，“巴拉达”号停泊在朝鲜南部济洲海峡附近的巨文岛[英

<sup>①</sup>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国书店2006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雨森藤五郎（あめのもり ほうしゅう），通称藤五郎或東五郎，号芳洲，字伯陽，讳俊良，朝鲜名为雨森東。1668年6月26日（寛文8年5月17日）出生，1755年2月16日（宝曆5年1月6日）去世，是日本江戸時代中期的代表性知识人士，通中国語、朝鮮語。曾出仕对马藩，参与和李氏朝鲜的通商事务。《翻译家笔记：对马岛周边环境的札记》的日文原名为《交邻须知》。

<sup>③</sup> *Дмитревский П.* Записк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при окруж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а о-ве Цусиме.Отано Кигоро (“Записки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XII, № 4, СПб., 1884



文称汉密尔顿港 (Port Hamilton) ]，负有军事和政治使命的俄国旅行者试图深入巨文岛内地，丈量海岸线并提出通商要求，结果与朝鲜人发生了流血冲突，后以双方克制和相互致歉而结束事端。4月7日，“巴拉达”号离开巨人岛，前往日本长崎。

这次“偶遇”是俄国人第一次登陆朝鲜，并较近地深入朝鲜社会，也使冈察洛夫终于“有幸见到这远东的最后一个民族”。<sup>①</sup>

由于西方语言文字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朝鲜的信息，以及斯帕法里、比丘林等俄国先行者已经介绍朝鲜概况，因此冈察洛夫等人见到身着白衣的朝鲜人已经没有了斯帕法里等人的惊异，在他的笔下除了对朝鲜和朝鲜人的表象化白描之外，更多的是颇有深度的思考。

冈察洛夫写道：“高丽王国建立不久，命运之神便开始戏弄于它，亦即是说，中国人、日本人、蒙古人轮番地对它进行征剿、讨伐、颠覆，使新旧王朝频频更迭。朝鲜国王软弱无力，只得听凭命运的主宰，归顺于中华帝国”“从政治说，朝鲜堪称独立国，因为这个国家是由自己的君主治理，既有自己的法律，又有自己的语言。朝鲜臣属于中国，除了表现为接受这种恩准外，每年还要派遣二百人的朝贡使团前往中国，向中国皇帝贺年。这种状况颇似在远方成家立业的儿子依附祖籍的父亲一样”“每当新王即位，必须遣使北京，……一般说来，中国总是照例恩准，而且收下贡品后，往往赐以更为丰厚的回礼。中国皇帝从不干涉朝鲜人的事务。”<sup>②</sup>

以上关于朝鲜国家体制和与中国关系的论述，显然不是此行能够提供给冈察洛夫的信息，说明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朝鲜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冈察洛夫在书中多次提到了比丘林和他的《中华帝国详志》《古代中亚居住各民族资料集》，他写道：“据雅金甫神父记述，朝鲜划分为八个行政区，或称八道。……如有兴趣，请自行翻阅一下上述知名汉学家的著作吧。”<sup>③</sup>

但是，冈察洛夫仍然感叹：“遗憾的很，日至今日，有关朝鲜的国内消息，诸如政策、富源、生产乃至风俗习惯等等，还是十分闭塞”“谁个对朝鲜有多少了解？唯有中国人稍许关系它，每年收取它的贡品。此外，还有日本人同它进行小规模的贸易。然而，这可是一块占八个经度的辽阔土地啊！”<sup>④</sup>

“巴拉达”号上无人懂朝鲜语，幸好舰上还有一位阿瓦库姆 (Аввакум) 神父，是第十一届 (1830-1840年)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略通汉语。通过阿瓦库姆神父，冈察洛夫等人得以以汉语与朝鲜人直接交流。

冈察洛夫记载：朝鲜人“村民也好，乡绅也好，一律穿着白色棉布或夏布的肥大长袍，里层还有代替衬衫的贴身衣他。此外，人人都穿着肥腰紧口的抵裆裤。……朝鲜人的履历与日本人的相似，……有草履，也有布鞋。”他认为：“综观起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琉球人都是一个家族的儿女。中国人是长房，人数最多，居于首位。他们之间有着不容混淆的共同特点”“朝鲜人的仪容举止远不如日本人和琉球人文雅，尽管三者都来源于一种文明——中国文明”“如今，我们终于见到了几乎构成远东的四大民族，但了解的程度不尽相同。一种是天天晤面，有过举足轻重的交往；另一个是表面相识；第三个是小住做客；最后是走马观花，如果不是按照血统（即如某些人推断的那样，日本同千岛群岛的虾夷人一脉相承），而是按照仅次于血统的教育、文化、习俗、习惯乃于语言、信仰、服饰等诸方面来看，那么上述四大民族无疑是属于一个大家庭。”<sup>⑤</sup>

<sup>①</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648页。

<sup>②</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8，649页。

<sup>③</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8页。

<sup>④</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649页。

<sup>⑤</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650，652，655页。

冈察洛夫亲眼见过朝鲜文书籍，认为“朝鲜文字不像汉字那样繁难”，他知晓“为了嘉勉朝鲜贡使对中国的恭顺和崇敬，中国人总是向他们传播自己的知识和文字，久而久之，在朝鲜便形成一种风气：凡重要公文和学术著述皆使用中国文字，而本国文字则多用于一般场合。”<sup>①</sup>

### 三、对俄国初识朝鲜的思考

跨民族和跨地域的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难以避免受自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制约，这对于“新大陆”的“开辟者”而言尤为甚之。这些“开辟者”往往身兼政治、军事、经贸、文化和科学的多重使命，因此他们的拓荒之旅尽管粗陋简从，甚至多有谬误，但仍然引人入胜。从这个角度来讲，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代表了17-19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由于地处遥远，信息封闭，讹传误说，俄国对东方和中国早期认识的模糊特性决定了它对朝鲜认识的片面性，而朝鲜对俄国的认识更显浅薄。

19世纪中期以前，在多数俄国人眼中，或者对朝鲜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把它看成是老大衰朽的中华帝国境内的一块未知土地。无论是斯帕法里，还是朗喀，都未能真正并且直接地与朝鲜人接触。他们笔下的朝鲜和朝鲜人大多是收集来的杂闻或途说。即使是比丘林也在《古代中亚居住各民族资料集》中把朝鲜归类为“中亚民族”，而犯了地理上的错误。

而冈察洛夫在与朝鲜和朝鲜人直接接触之后，徒生出来的无限感慨和对中国文明的严厉批评：“中国人是这个大家庭的兄长，他把中国文明分给了小弟弟们。您也知道，这是什么文明，它何以会停滞不前，脱离生活，走向衰落，而迄至今日，它仍束缚着亚洲大陆东南地区和日本列岛广大民众的活力。”<sup>②</sup>很明显，这一段话不仅体现了作为欧洲白种人的冈察洛夫的傲慢，而且体现了作为“西方派”的冈察洛夫的文化偏见，不过是重弹19世纪30年代“西方派”鼻祖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中的老调而已。<sup>③</sup>

比较而言，同时期朝鲜对俄国的认识则更为模糊。

朝鲜第一次知晓俄国是于1654年受清政府礼部之邀联合抗击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此时，朝鲜对俄国和哥萨克一无所知，清政府使臣韩巨源面见朝鲜国王孝宗时，孝宗不解地询问：“罗禅是何国也”，韩巨源回答：“宁古塔之傍有别种，此乃罗禅也。”

朝鲜吏朝参议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1788-1853）19世纪30年代以书状官身份出使北京，期间与俄罗斯人多有交往，并著有《鄂罗斯馆记》（1832年）。书中记载：“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以其人皆鼻大，故或称大鼻捩子，即蒙古别种也。”<sup>④</sup>时至19世纪，饱学之士金景善仍然像一百余年前的朝鲜国王一样将俄罗斯人视为蒙古人种的旁支，实在是孤陋寡闻和以讹传讹了。

1854年4月，作家冈察洛夫随“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登陆朝鲜巨文岛时，在约见当地朝鲜人时，一位有着地方长老模样的朝鲜老丈“劈头第一句话就问我们是何方蛮

<sup>①</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8页。

<sup>②</sup>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655页。

<sup>③</sup>恰达耶夫认为：“中国从远古起就拥有三件伟大的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然而，这三件工具帮了中国什么忙呢？中国完成环球航行了吗？他们发现过一片新大陆了吗？他们是否拥有更为广博的文献，超过我们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有的文献？……我个人认为，这一作为最古老的自然文明和所有人类知识萌芽之承载者的民族，其不同寻常的毁灭还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教训。”（参见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sup>④</sup>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页。



夷，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们，触摸我们的制服，头发和手上的皮肤。有人甚至脱去我的皮鞋，反复端详，然后又仔细地看了袜子、阳伞、军帽等等。”<sup>①</sup>

这些事例说明 17-18 世纪，乃至 19 世纪的朝鲜对于外部世界仍然所知甚少、一片茫然。而且它关于外界的信息多来自中国，也说明此时的俄国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都是未知的国度和民族。

第二，俄国政界和学界初识朝鲜，首先是服务于政治性和军事性目的，其次才体现为文化性和学术性目的。

按照沙皇政府的要求，不仅斯帕法里等政府官员使华归国后，要及时地向沙皇政府报告沿途和所到之地的政治、社会和军事情报，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充当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更有义务定期向外交部或沙皇本人提交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的重要信息。因此，斯帕法里向沙皇政府提交的报告《穿越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的旅行》、《行程札记》、《中国纪行》和《中华帝国志》等书“最初被作为国家机密，只能在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帝国的极少数政要中传阅”。<sup>②</sup>17 世纪末，上述报告部分被解禁，得以在社会上公开刊行，但立即在俄罗斯和欧洲出现了多个抄本和多种文本。1910 年，才在喀山第一次出版了古教会斯拉夫文体的《中华帝国志》。

(作者张建华，1962 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Record and knowledge of Korea in pre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Zhang Jianhua

**Abstract:** There is little record of Korea in russian literature before mid-19<sup>th</sup> century, which is called early period when Russia came to know Korea. Spafari, Lang, Bitchurin and Goncharov are the russian examples of 17<sup>th</sup> – 19<sup>th</sup> century who came to know Korea, and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Spafari, Goncharov, Bitchurin, Korea

<sup>①</sup> 冈察洛夫著，黄倬汉译：《环球航海游记》，海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51，655 页。

<sup>②</sup> 齐吉柳：《在想象的地平线上》载《浓情挚意万万千，中罗关系三百年》，Ion Cristoiu 出版有限公司，布加勒斯特 1999 年版，第 30 页。转引自：刘勇：《百年中罗关系史（1880-1980）》，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